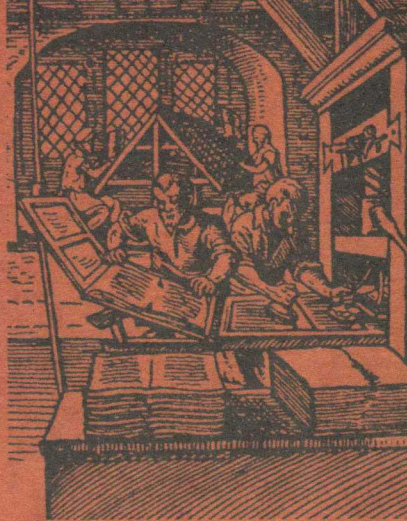




王志毅 著

文化生意

——印刷与出版史札记



文化生意

——印刷与出版史札记

王志毅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生意：印刷与出版史札记 / 王志毅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6
ISBN 978-7-308-14697-5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出版事业—文化史—研
究—世界 IV. ① G23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00534号

文化生意：印刷与出版史札记

王志毅 著

责任编辑 王长刚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8.5

字 数 85千

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697-5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序

我之本性，面上温和，实则是一个不肯服输的人，做事争强好胜，内心中不大会臣服别人。但随着年龄增长，却发现自己对人对事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对后辈才俊，竟然在不自觉中，没有了竞争意识，反而产生某种无私的欲望，总想要扶持他们，或招致麾下，或预言哪位优长，未来必有大成云云，都是一件极其快慰的事情。这样的心境，在血气方刚之年，是体会不到的。盘点心中喜爱的人，或兄弟，或子辈，或孙辈，想到精神的延续，想到生命的希望，善的情绪就会升腾起来，内心中充满对他们的爱意。

王志毅是我极看重的一位青年人，现在也有三十几岁了吧。我认识他却在2006年，那时我还在辽宁工作，工作之余为《辽宁日报》写专栏文章，写法是报社主编命题，他们拿来一本或几本书，让我写整版的评论文章。其中有一期，是评美国人泰勒·考恩的著作《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我写的文章题为《文化多样性：左手赞成，右手反对》。我在文中提

到译者，认为他的译者序言写得有水平，认为这样的译笔一定不是出自匠人之手，应该是一位很不错的学者。大约在我的文章发表一年后，译者王志毅见到此文，他给我写信，我才知道，他是一位二十几岁的青年，而且在出版界做事，主持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分社——启真馆。当时我确实感到惊讶，因为我知道，出版圈中有学问的人不少，勤奋的人却不多。大概是行业特征使然，最容易养成从业者眼高手低、勤于动口、懒于动手的习惯。其中较好的人，能够满足“做出版人中最好的作家，作家中最好的出版人”，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见到王志毅这样的青年才俊出现，我怎能不喜出望外呢！

不久志毅送我启真馆小礼物，仿木质烫花工艺的一套案上用品：笔筒、名片盒、裁纸刀等，更使我赞叹江南人物，做商人也有出离尘世的雅趣，心中又增添几分喜爱。

2009年我到北京工作，志毅见到我的著作《一面追风，一面追问——大陆近二十年书业与人物的轨迹》繁体版，立即提出要出简体版，那就是《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了。他还借此创立“守书人丛书”，如今已经出版多种，其中有名的著作如《我在DK的出版岁月》、《编辑这种病》等，都是我喜爱的书。

去年志毅的文集《为己之读》出版，篇幅不大，当时我就想写一点评论，因为心中对这本小书有三点喜爱：一是思想性，二是文章气质，三是字面干净。当然文如其人，这些年与志毅时常接触，他面上话不多，交流时不冲撞别人，举止上还有些

腼腆羞涩的感觉。其实王志毅在两项事情上，最能表现出众之处，一是“言必信，行必果”，说到的事一定会做到，这却是时下商界稀缺的品格，他却有了。再一是每逢讨论学术问题，他的学者气质就会表现出来，不逢迎，不含糊其词，不看他人脸色，那种直言表述的风度，就更加难得了。比如去年，我曾经写文章《出版，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动机》，品评美国人理查德·谢尔《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一书，其中谈到18世纪英国出版，我援引书中观点，阐释英国出版业对欧洲文化启蒙运动的贡献与作用，所用词语赞誉过重。志毅在网上读到此文，立即留言反驳，认为这样的评价失之偏颇。后来我在读书时发现，志毅曾送给我几本“启蒙运动经典译丛”，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都与上述问题有关。由此可见，志毅是一个认真研究问题的人，说话冷静思考，言出有据，如此坚持下去，积年有成，一定是自然的事情。

前些天志毅来信说，他的新著《文化生意——印刷与出版史札记》基本写好，希望我能为之写一篇序言。这真是一个好题目，因为我一直认为，目前中国有出版史，却没有书籍史。上面提到的谢尔《启蒙与出版》一书，就给出了一些让人惊讶的回答。他说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产生感到迷惑，究其原因，正是忽略了一个重要学科“书籍史”的研究。因为在作者“文本”变成“书籍”的过程中，包含着许多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以往欧洲学者信奉笛卡尔的观点——“阅读时要忽略书籍的外观、感觉和嗅觉”，认为文本与书

籍是分裂的。即使福柯在他的《作者是什么？》中，也至多承认“作者功能”是通过评论家和读者实现的，没有谈到书籍本身的作用。其实对于苏格兰启蒙运动而言，书籍出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我们的文学史、文字史、学术史和思想史中，却丝毫看不到书籍史的存在，说白了，也就是书商的存在！比如出版过程、书籍的产生、作者与书商的往来信件，里面谈版税、谈开本、谈定价、谈装帧、谈广告、谈市场……这些被传统学者们不屑一顾的内容，最多被当做历史学的花边或八卦，谢尔却从中发现了“苏格兰文人共和国”名扬天下的玄机。

阅读志毅的书稿，我看到他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且试图给出一些新的阐释与研究。书稿之中，他谈论西方印刷术的历史，资料丰富；而有两个章节，专论中国宋明两代印刷术的发展，落笔之时，自然有了中西互应的尝试。另外此稿的名字也引人思考，说是“札记”，其实用的却是学术专著的笔法。尤其是“文化生意”一词的设立，恰恰点明了他学者与书商双重身份的优势。有了在两个领域游走的经历，他才会做到知行合一、心态平和，既不为文化而轻视生意，也不为生意而亵渎文化，由此深入下去，创作中国书籍史的功力就会显现出来。

也可能是游动的人生体验，经常会给志毅带来思想波动的苦恼。他有时也会找我聊天，谈论书商生活的优劣，以及投入学界的思考。其实有才华的人总会不安分，跨界的能力常常是他才华大小的重要标志。此时志毅的才华已经早早显现，书编得好，就影响了学问；学问做得好，又影响了心境。但人生之旅，面上千奇百怪，

序

实则大同小异。智者多思多虑，双成者是有的，如钟叔河先生；多成者也是有的，如叶圣陶先生；一事无成者，却也满目皆是。我始终认为，人生的追求，首先是快乐，是平静地生活；其次在天赋，在路径，更在勤奋。我一直看重志毅，就在这里。

俞晓群

目 录

序.....	i
引论.....	1
数字出版的兴起.....	1
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4
本书所涉.....	7
印刷术与宋代思想的变迁.....	11
一、印刷术的出现.....	11
二、印刷术的成熟.....	14
三、印刷术与宋代思想的新特色.....	22
四、印刷术与理学思想的完成.....	32
五、结语.....	42

从士大夫走向四民——明代的商业文学与商业出版	47
一、商业出版走向成熟	47
二、从《三国演义》看商业文学的兴起	53
三、通俗文化的再造：“经典化”还是“流行化”	65
四、结语	75
 贩卖知识——印刷出版与知识的商业维度	81
一、印刷出版的兴起	81
二、出版商主导的生产模式	88
三、出版与专业化	96
四、出版商如何主导生产	100
五、知识的传播与保存	103
六、出版形态对知识生成的影响	110
 参考文献	115

引 论

数字出版的兴起

毋庸置疑，在高速移动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冲击之下，传统出版及其所代表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模式的确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当代的数字技术已经革命性地改变了知识的传播与存储方式。一方面，随着 3G 以及 4G 无线通信系统的普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随时随地接收及发送包括文字、图像、音频、视频在内的各种媒体信息，从而彻底解决了所谓的“最后一英里”问题。当然在现实操作中，这一点事实上还未能完全做到。这主要是受限于基于传统国家界限的知识产权束缚。

另一方面，云计算的发展趋势又使得用户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单独依赖于所持有的终端，利用“云”，也就是“一组可以通过因特网公开访问的计算机和服务器”^[1]，即时的软件更新、无

[1] 迈克尔·米勒，2009，云计算，第 10 页，机械工业出版社。

限的存储容量，以及群组协作等功能都可以得到实现。

按照已故的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的思路，云计算可以令苹果公司的用户通过简单的自主设定，在苹果公司的各类产品（包括 iPhone，iPad，iPod，iMac）间自由共享各种软件、音乐、文档、视频，而且这种共享是即时、自动的。也就是说，苹果 i 系列产品的用户间可以自发地组成一个即时无线共享网络，这当然是数据存储与互享的又一次跃进。相应的，它也会引发人们对苹果公司垄断未来数字时代商业的担忧。

在知识的存储与共享方面，比云计算更具根本性的设想是构建全球数字图书馆。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建设面向数字时代的未来图书馆。在此基础上，克里斯廷·博格曼很早便提出了全球数字图书馆的概念，也就是通过在各个图书馆间共享编目数据，从而将所有数字图书馆连接在一起。^[1]

不过正如博格曼自己所指出的，当前的版权和知识产权法更倾向于保护出版商的利益，使得这一设想的实现一直面临巨大的困难。而专业出版商在构建数据库方面已经拥有了非常成熟的技术和商业手法。大型的专业出版机构将旗下的电子书与电子期刊整合起来，以打包的形式销售给学术机构与大学图书馆，从而获得了更为丰厚的利润。

对当前的专业出版商来说，出版（包括数字出版）收入通常只占它的营业收入的一小部分。以全球领先的专业出版公司

[1] 克里斯廷·博格曼，2003，从古腾堡到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中信出版社。

Reed Elsevier 为例，它的核心定位是信息内容和解决方案的提供商。除了出版以外，它还有其他三家子公司，分别提供法律资料信息、展览和会议活动主办、商业信息等服务。这些服务全都依赖于企业所建设和共享的各类专业数据库，因此这类公司是当之无愧的数据信息和内容提供者。

另一个重要的创新便是饱受争议的“谷歌图书搜索计划”。自 2004 年以来，谷歌便开始与各大图书馆合作，将图书扫描上传至其服务器，为谷歌的使用者提供免费的搜索服务。这一史无前例的计划当然遭到了出版商和作者的强烈抗议与诉讼。经过历时两年的谈判，谷歌以赔偿 1.25 亿美元以及分享相关销售收入为代价，与美国作家协会和美国出版商协会就已有的图书上传达成了和解。此后，它仍不时与其他国家的图书出版商产生法律纠纷。但它与数万家出版商合作，已经实现了上千万册图书的扫描，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性质，这当然也引发了许多学者的担忧。曾任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的罗伯特·达恩顿就认为谷歌已经控制了大多数美国人的网络信息获取方式，而上述和解方案恰恰增强了谷歌的垄断地位。在他看来，只有政府出面制定公共政策，制止“谷歌和图书馆私自结盟”，才有可能阻止这场垄断的噩梦。^[1]

不过，知识的传播与存储是一回事，知识的生产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当代数字出版所影响的仅仅是知识（信息）的传播、

[1] 罗伯特·达恩顿，2011，阅读的未来，第 65 页，中信出版社。

存储、检索、浏览，那它的革命性便会大打折扣。从手抄本到纸质印刷出版的技术变革，所代表的不仅是知识传播方式的进步，更呈现了一种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在过去五百多年中，纸质出版代表了一种主导性的知识生产与呈现模式。谷登堡的印刷术在西方普及了文化与教育，奠定了现代学术共同体的传播基础，推动了18世纪以来的民主化进程，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主要基石之一。

值得指出的是，从历史上看，纸质出版在变革社会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通过一系列制度革新与安排而得以逐步实现的，这其中包括教会垄断知识时代的终结、基础教育的普及、大学及科研组织的兴起、社会的专业分工等，没有这些变革的协同出现，印刷术自身的能量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可以推想，数字出版能否产生如纸质印刷术一般的革命性影响，便取决于社会是否会出现与数字出版相配合的重大制度变革，如大学制度与学术体系的变革、知识产权理念的转变，乃至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调整等。如无相应的制度革命，数字出版的最大意义便不过是给人们多了一种阅读的选择而已。

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政府主要在两个方面影响整个文化产业的进退，一方面是通过各种渠道补贴文化产业，从而改变文化生产的供给与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借助法律制度塑形文化产业内部的结构与组织。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之所以要补贴文化产品，是因为它具有相当的外部性。布鲁诺·弗雷将文化产品的外部价值分为五类，分别是：（1）选项价值，也就是人们可以从较多样的文化供给中获益；（2）存在价值，某些文化产品或活动的存在本身便能让人获益；（3）遗产价值，某些文化产品会造福于下一代或下几代；（4）声望价值，艺术产品的存在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声望；（5）创新价值，艺术产品有助于发展整个社会的创造性思考。^[1]

要扩展文化产品的多样性，就需要在市场之外建立补充性（而非替代性）的文化生产机制。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政府资助文化艺术的方式可以粗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类。欧洲国家通常用财政支出的方式直接补贴文化艺术机构，而美国则选择以影响相对价格或相对收益的方式间接刺激艺术的生产。

所谓的间接方式，主要就是通过税收抵扣的方式鼓励个人和企业捐赠艺术生产部门。在 2003 年，美国人便向艺术和文化领域捐赠了 294 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人 100 美元。^[2]美国企业在资助艺术方面也非常慷慨，主要资助方向包括交响乐队、表演艺术中心、博物馆和剧院等。

另一个重要的艺术资助方式便是私人基金会。美国政府对私人基金会也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最主要的基金会包括

[1] Bruno Frey, 2000, *Arts and Economics*, Springer, pp.101—102.

[2] Tyler Cowen, 2006, *Good and Plen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33.

J. Paul Getty Trust, Lila Wallace-Readers Digest Foundation, Mellon Foundation 等。其中最大的 Getty Trust 平均每年在艺术博物馆和艺术研究中心上要花费 2.5 亿美元。^[1]

泰勒·考恩认为美国的艺术资助体系是非常成功的，这个体系包括资本家的财富、竞争性的市场、多元的经济支持渠道，以及间接的资助方式。尽管美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政策，但却鼓励人们不断地发挥创意。弗雷也认为，在很多情况中，应该更多地用税收的形式提供间接补贴。^[2] 不过两种资助形式的后果完全不同，存在一定的不可比性。欧洲的补贴形式更侧重于精英化的商业文化，它所催生的作品可能与市场的选择完全不同。而美式资助体系在本质上是扩展市场选择的边界，它并不试图去代替市场选择。

即使是当代的商业文化，仍然深受供需之外的各种制度设计的影响。前面已经提到知识产权法对数字出版和数字图书馆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当属政府的管制与资源分配。美国的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在广播领域有权发放许可证。理由是不同的信号之间可能会互相干扰。而分配的根据则是“营运商在为公共利益服务上表现的相对优劣”。^[3] 在电影业，最著名的例子要属“派拉蒙法案”。在 1948 年以前，美国电影产业呈现出典型的寡头垄断局面，最大的五家公司都是垂直一体化的运作

[1] Tyler Cowen, 2006, *Good and Plen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35.

[2] Bruno Frey, 2000, *Arts and Economics*, Springer, p.114.

[3] 小贾尔斯·伯吉斯, 2003, 管制和反垄断经济学, 第 48—49 页,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体系，同时拥有电影制作、发行和连锁戏院。美国最高法院在1948年裁决五大公司违背了谢尔曼反垄断法，强制要求电影制作与剧院分离。这对美国电影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今天的中国，许多电影制作公司都向下游挺进，经营电影院放映业务。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与实施显然能够直接影响文化产业的生产结构。

在出版业，亚马逊已经宣布要进入出版领域，它是典型的垂直一体化生产模式，制作内容后，便直接进入发行终端。它是否违背了美国的反垄断法，又是一个有待后续观察的可能案例。

本书所涉

以上点滴残篇，其实与全书的内容无关。本书只是作者走马观花中西出版史的一点札记，且所关心的时间段都在百年以前。随着本书的完稿，这段探索旅程也要告一段落。不过上面两节所述，可算是我关心出版史的动力来源，之所以从对出版史一无了解，转而涉入其中，主要还是在于对文化如何成为一门生意的兴趣。知古可以悉今，至少为未来寻找可能的途径。

正文中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宋代出版与理学的关系，有部分篇幅涉及印刷史上的一些疑问，如印刷术的起源等，这也是因为它与早期出版密切相关。关于朱熹的出版工作部分，包含了作者的心理猜测，毕竟今天已经难以知晓朱熹当年的心态究竟为何，不过从他本人的执着态度来看，印刷术似